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楚辞》训诂史

黄建荣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楚辞》训诂史

黄建荣 著

Chuci Xungu Shi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训诂学与楚辞学交叉结合的研究著作。它从传统训诂学的角度出发,在梳理古代到近代《楚辞》训诂产生、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其中五十馀部《楚辞》训诂著述为考察对象,对其时代特点、训诂出发点,以及体例、注音、释词、析句、论章、解篇等方面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分析和比较,从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楚辞》训诂发生、发展、成熟的全过程。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楚辞》训诂史 / 黄建荣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04-042824-7

I. ①楚… II. ①黄… III. ①楚辞-训诂-研究
IV. ①H131.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155号

策划编辑 王丽
责任校对 刘娟娟

责任编辑 孙璐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封面设计 钟雨

版式设计 于婕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市大天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开本 850 mm×1168 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55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79.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2824-00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汉代的《楚辞》训诂	8
一、《楚辞》训诂兴起的主要原因	8
二、王逸之前的《楚辞》注释和研究	9
三、王逸撰《楚辞章句》之动因	10
四、《楚辞章句》的训诂特色	11
五、《楚辞章句》训诂的不足	2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楚辞》训诂	22
一、魏晋南北朝的《楚辞》训诂概说	22
二、郭璞的《楚辞注》	23
三、隋唐五代的《楚辞》训诂概说	27
四、智騫的《楚辞音》	28
五、三家《文选注·骚》	32
第三章 宋元的《楚辞》训诂	36
一、宋元的《楚辞》训诂概说	36
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	39
三、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	54
四、朱熹的《楚辞集注》	56
五、钱杲之的《离骚集传》	72
第四章 明代的《楚辞》训诂	76
一、明代的《楚辞》训诂概说	76
二、汪瑗的《楚辞集解》	80
三、黄文焕的《楚辞听直》	92
四、陆时雍的《楚辞疏》	99
五、来钦之的《楚辞述注》	104
第五章 明末清初的《楚辞》训诂	111
一、明末清初的《楚辞》训诂概说	111
二、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	115
三、李陈玉的《楚辞笺注》	125
四、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136

五、钱澄之的《屈诂》	145
第六章 康熙中叶至雍正的《楚辞》训诂	151
一、康熙中叶至雍正的《楚辞》训诂概说	151
二、林云铭的《楚辞灯》	157
三、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	165
四、王邦采的《离骚汇订》《屈子杂文笺略》	170
五、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	176
第七章 乾隆至道光前期的《楚辞》训诂	192
一、乾隆至道光前期的《楚辞》训诂概说	192
二、王萌的《楚辞评注》	197
三、屈复的《楚辞新注》	209
四、戴震的《屈原赋注》	215
五、胡文英的《屈骚指掌》	228
六、陈本礼的《屈辞精义》	235
第八章 道光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楚辞》训诂	244
一、道光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楚辞》训诂概说	244
二、朱骏声的《离骚赋补注》	249
三、俞樾的《读楚辞》《楚辞人名考》	255
四、王闿运的《楚辞释》	265
五、马其昶的《屈赋微》	275
第九章 《楚辞》训诂综论	287
一、《楚辞》训诂与经书训诂的时代特点和出发点比较	287
二、《楚辞》训诂的篇目和体例比较	292
三、《楚辞》训诂的注音特点综说	299
四、《楚辞》训诂的字词注释特点综说	301
五、《楚辞》训诂的句意和章旨注释特点综说	307
六、《楚辞》训诂的补充注释特点综说	311
结语	316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4

绪 论

一

以屈原为代表所创作的《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诞生，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学者根据个人的理解为《楚辞》进行校勘、注释、考证、评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训诂学也在缓慢发展，这都使得研究或注释《楚辞》的专著不断增多，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训诂的内容，扩大了训诂的范畴。实际上，从古至今众多《楚辞》注本，已构成了一部《楚辞》训诂史，它与其他子部、史部等古籍的注本一起，皆是传统训诂学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综观中国训诂史，由于训诂一直被认为是经学的附庸，现当代的大多数专家与学者在从事训诂学研究时较多注重的是经部书籍及其注疏本，而对其他部类的书籍及注疏本专门考察研究的论著都十分有限，目前的大部分训诂学著作也只是有部分章节提及。

由此可知，无论是训诂学还是楚辞学，在《楚辞》训诂与传统训诂的交叉结合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空白点，这种空白点无论是对于当今训诂学研究的深入，还是楚辞学研究视野的开拓，显然都是一种缺憾。本课题的研究，就在于尽力弥补这一缺憾，即从训诂学和“史”的角度对《楚辞》训诂产生、发展、繁荣的全过程进行整体描述，反映《楚辞》古代诸注本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关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训诂学价值；同时在对《楚辞》古注运用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详细的剖析、比较和综合论述的基础上，论述《楚辞》古注与传统训诂学之间在注释出发点、注释篇目、注释体例、注释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归纳《楚辞》训诂所体现出来的集部书注特点，以及它们在传统训诂学、现代楚辞学中的价值和重要地位。

目前，国内的训诂学专著大致有二三十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洪诚的《训诂学》，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赵振铎的《训诂学史略》，陆宗达、王宁的《训诂与训诂学》，周大璞的《训诂学初稿》，冯浩菲的《中国训诂学》，李建国的《汉语训诂学史》等，但他们对《楚辞》训诂的情况皆没有专章专节叙述而只是有所提及；至于训诂学界专题探讨《楚辞》训诂的论文更是寥若晨星。

再从近两千年来的楚辞学史来看，按照姜亮夫先生和崔富章先生的观点，自汉代到20世纪初的楚辞研究大致有四种模式：辑注、音义、考证、论评^①。这四种模式是古代楚辞研究的主流并为一些现当代学者所沿袭，只不过其间有些许变化和发展。如在明中叶之前，王逸、郭璞、洪兴祖、钱杲之等大多数学者是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为主体的考证型；明中叶以来，既有汪瑗、黄文焕等一些学者的著述把重心转向文学特点评价、分析的倾向，又有蒋之翘、沈云翔、陈深、来钦之等诸家注本以评点为重心。

^①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富章：《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第10期。

而到了清代,又出现了如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的札记类著述。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们借鉴西方文艺观点和方法研究楚辞之风兴起,使得现当代的楚辞研究开始进入百花齐放时期。如梁启超《屈原研究》从文艺学、文化研究的角度,李翘的《屈宋方言考》从方言的角度,饶宗颐的《楚辞地理考》从地理考证的角度,闻一多引入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进行的文化综合研究,游国恩的《楚辞概论》从民间文学和地域性方面溯源的探讨,郭沫若尝试用唯物史观的研究并利用今译、话剧创作等形式对屈原的传播,姜亮夫的《屈原赋注》则以语言、历史为主并结合多学科知识的综合研究,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楚辞研究集成》《楚辞学文库》《屈原学集成》《中国楚辞学》等百余部专著(丛书、期刊)和三千多篇论文的相继推出,这些虽然表明学术界在“楚辞学”这一学科研究上的不断深入,但尚无从训诂学的角度来探讨《楚辞》训诂的专著,其针对《楚辞》古代注本的相关的论文也大都是孤立地讨论其中的一二注本(或王逸,或朱熹,或洪兴祖,或汪瑗,……)的特点,较少以训诂学的原则、特点、方法等方面作整体的观照和全面、系统的归纳分析。

由上所述,可知无论是训诂学还是楚辞学,如果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其研究的视野将显得相对狭窄。而在当今时代,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结合研究已成为一种趋势,本书则是顺应这一趋势,拟从传统训诂学角度出发,以集部书的代表作《楚辞》为例,在吸收古今《楚辞》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楚辞》训诂产生、发展过程的一般性叙述,并通过对古代至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楚辞》著述在注释出发点、注释特点、注释方法等方面的解剖、比较和分析,从中既归纳和总结出传统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在《楚辞》训诂中的运用特点,也归纳和总结作为集部书注的《楚辞》注本所体现的自身注释特点,进而比较出传统训诂与《楚辞》训诂之间的异同,从而一方面较为清晰地展示《楚辞》训诂本身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楚辞》训诂在传统训诂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对现代楚辞学的重要启示。

二

在众多的《楚辞》古代专著中,如何选择研究对象是一个颇需斟酌的问题。

《楚辞》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正式结集以汉代刘向编辑的十六卷本《楚辞》为标志。据不完全统计,从汉至民国初年约两千年来,有数以千计的学者从事《楚辞》的辑集、注释、考订、评论等工作,留下了二三百种专著、专论和札记^①。就一百多种专著来说,现当代学者多按类划分,如游国恩先生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②,姜亮夫先生和崔富章先生分为辑注、音义、考证、论评四类,张来芳先生分为考据、辑佚、韵读、训诂、词章、义理六类^③,等等。这几种分类皆能自成其说,然笔者以为姜、崔二位先生的分类更为合理些。那么,这四类《楚辞》古代要籍中,哪一类与传统训诂学的渊源关系更密切些呢?回答应该是首推辑注类,其次是考证类。至于音义类和论评类,虽然其侧重点分别是对《楚辞》音韵的探讨和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但其中也有一些牵涉训诂。此外,还有一些札记类著述与《楚辞》训诂有一定关系。即便如此,按姜亮夫先生编著的《楚辞书目五种·总目》之第一部的“楚辞书目提要”

① 愚按:二三百种只是一个约数,因为笔者至今尚未统计也没有看到楚辞学者统计的确切数目。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一部“楚辞书目提要”中共录四大类著述218种(含近现代学者二十多种),第四部又录札记类25种;周建忠、李大明《楚辞学通典》之五录典籍453种,其中截至清末民初马其昶为113种;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附录的“楚辞专著目录”列235种,其中标明为清代之前的有138种。

② 游国恩:《楚辞概论》,见王云五主编:《国学小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版,第280页。

③ 张来芳:《现代楚辞学鸟瞰——〈楚辞学史〉之五》,《赣南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30页。

所定,属于辑注类的共有 124 种,属于考证类的共有 26 种。属于辑注类的《楚辞》要籍,还包括三十多种存日本、辑集本和近现代注本,考证类中还包括古今十五六种的附录本^①。存日本由于已失传而无法见其全貌,辑集本由于是《楚辞》作品的汇编而其价值主要在版本方面,近现代注本由于不属于古代的范畴,附录本由于多为附录于辑注类注本之中,故均不宜以专节讨论或概要分析。这样选择后,剩下的专著还有 100 种左右,数量仍较多。考虑再三,又依照姜亮夫先生的分类和本文所选注本的要求来考察洪湛侯先生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洪先生所编之书介绍古今《楚辞》注本共 62 种,按上述要求可以剔除其中的 22 种,还剩 40 种。这 40 种注本加上姜氏所定的部分他类注本 10 种左右,就是本书所选择的基本研究对象。

那么,对这些基本研究对象应如何进行分析呢?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对这 50 种左右的注本进行全面、详细的解剖分析虽有必要,但也要有所侧重。关键要考虑三个方面:其一,尽管每部注本都有它的自身特点,但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常常是有多部类似的注本出现,只要选择同时代中较具代表性的几部注本予以解剖分析,就可以类推该时代其他同类型注本的大体情况;其二,传统训诂学是一门有着鲜明特色的学科,既然是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要籍,那么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则应尽可能地显现出训诂学所具有的原则和方法,但其中有些《楚辞》注本虽然整体上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却只是在论评中夹有简单注释而缺乏训诂学的本身特色,所以此类注本只要举其少数代表作分析或概说之即可;其三,汉、宋、明、清是传统训诂学兴起、发展、繁荣过程中的四个重要朝代,《楚辞》训诂与传统训诂虽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是以同步发展为主,因此对这四个朝代的《楚辞》训诂著述可以作为重点描述和分析的对象。

三

本书既名《〈楚辞〉训诂史》,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合适分期,以符合“史”的要求。上文说到汉、宋、明、清是《楚辞》训诂史上的重要朝代,但并非说可依据这四个朝代来确定其分期。《楚辞》训诂既是一部专题史,那么它的兴起、发展和繁荣的过程,尽管与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相伴随,但更重要的,是它又与传统训诂学史和楚辞学史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考虑其分期的时候,既不能完全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也不能完全依附于传统训诂史的兴衰,而应该在充分考虑到本书主要是描述历代《楚辞》训诂这一特点的基础上,为《楚辞》训诂史找到一种相对合理的划分依据。

汉代是训诂学和楚辞学的共同兴盛时期,但东汉和西汉有所差异。西汉已出现《尔雅》《方言》,以及《诗经》毛传等训诂要籍,但没有《楚辞》训诂专书;东汉有以郑玄为代表的一批训诂学家,也出现了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的《楚辞》训诂专书。魏晋至隋唐五代,历经七百多年,但训诂学与楚辞学的发展不大同步。一方面是训诂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不仅有一批训诂工具书的出现,对佛、道、史等典籍的注释也使训诂范围得以扩大,也出现了“义疏”这种新的注释格式;另一方面,虽有晋郭璞《楚辞注》和隋智𪔐(一作智𪔐,一作道𪔐)《楚辞音》,以及唐代李善、五臣、陆善经注《文选》时附带的《楚辞》选本可值一提,但《楚辞》训诂整体显得萧条,没有出现可作为代表性的典型专书。宋元时期,训诂学

^① 附录本是笔者所命名,主要指一些本来是古代注本中的一些附录,而姜先生抽出另列于考证类,如将朱熹《楚辞集注》中的《楚辞辩证》、汪瑗《楚辞集解》中的《楚辞蒙引》和《楚辞考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的《楚世家节略》、戴震《屈原赋注》中的《通释》等归于考证类。另外,其他类别中也有些附录被姜先生归于他类的情况,如将黄文煊《楚辞听直》中的《合论》、陆时雍《楚辞疏》中的《杂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的《馀论》等归于论评类,将洪兴祖的《楚辞考异》和《山带阁注楚辞》中的《说韵》、戴震《屈原赋注》中的《音义》归于音义类,等等。这些附录将在后面相对应的章节中与注本一并介绍,不再另行说明。

与楚辞学的发展基本同步,但宋与元有所不同。宋代由于学术风气渐变,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使训诂学呈现一种继承传统之“汉学”与阐释义理之“宋学”交织在一起的风貌。这种新旧交织的现象反映在《楚辞》训诂中,既产生像洪兴祖《楚辞补注》、杨万里《天问天对解》和钱杲之《离骚集传》这样的继承汉学传统之作,又开始出现如朱熹《楚辞集注》渗透义理之书。元代由于学术风气沿袭南宋馀绪而与宋代联系密切,其中训诂学主要是沿着朱熹开创的道路前行但渐趋笃实,而楚辞研究领域除已失传的刘庄孙《楚辞补旨音释》之外,尚无其他《楚辞》训诂专书传世。明代的训诂学和楚辞学的发展也基本同步。不过,明代的学术风气呈现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特点。明中叶之前,训诂学领域基本上是承袭宋元以来疑古创新之风的馀绪,而《楚辞》注释和研究则仍以朱熹的《楚辞集注》为尊。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倡导的“心学”既促使了求变创新风气的形成,也助长了空疏臆说等治学陋习。这种风气也渗透于楚辞学领域,使《楚辞》注释与研究呈现出多样性:既有在继承传统训诂学原则与方法基础上开始注意探讨《楚辞》文学性特点的专书,也有偏重探讨《楚辞》思想、结构之类的专书,还有以朱熹注本为基础的较显空疏的评点类专书。

清代无论是训诂学还是楚辞学,都属于繁荣期,其繁荣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由于学术流派很多而使训诂学著作和《楚辞》训诂著作皆数量众多。在训诂学方面,仅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载统计,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训诂著作分别大约为1248部、617部、425部和270部。在楚辞学方面,据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所载,仅与训诂学较密切相关的辑注类著述就有四十余种,超过以往历代同类著述的总和。如此众多的楚辞类著作,不仅因为时代、学术氛围、著者个性等不同而出现差异,而且也难以用一两个章节就能全面描述,故对清代的《楚辞》训诂期加以细分是必要的。明末清初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时间跨度约50年,训诂学总体上虽无大的变化,也开始寻求平正务实,开清代朴学先河。然由于朝代更迭这一特定因素,以至于这一时期《楚辞》训诂也较为特殊。尤其是周拱辰、李陈玉、毛奇龄、王夫之、钱澄之等由明入清的遗民学者,因为他们大都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变迁而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深有感触,故能将国家的沦亡之痛和个人的身世感慨融入《楚辞》注释和研究中。康熙中叶至雍正年间的训诂学,是在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兼收汉唐训诂成果,其补阙疑、寻平正、求实证的学风逐渐盛行。然就楚辞著述而言,则与明代一样显出其多样性,其类别大致包括:以阐述儒家性理、清廉节操、忠孝大义为中心;增补前人阙释或去凿说为主;着重从文学角度注释分析;沿袭明代评点方法且兼用传统训诂;专门探讨前代《楚辞》注家得失。从乾隆到道光前期,训诂学和楚辞学均为古代鼎盛,但它们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同时又有所不同。就训诂学而言,以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被削弱,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朴学占据学术主导地位。从楚辞学来看,研究和注释之作亦呈现多类别特点,其著述数量约有40部,其中仅辑注类著述就有十多部。它们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有乾嘉学派之风而较重考据训诂的著述;二是承袭明末以来较重视别立新说学风和偏重于文学分析的著述。道光中叶至清末民初,是时代转型过渡期,训诂学与楚辞学出现新动向。一方面,训诂学领域受阐发《春秋公羊》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复兴影响,使得《楚辞》训诂也出现了以疑古求异和阐发微言的著述;另一方面,是继续沿着前一时期道路前行的乾嘉学派朴学之作和偏重宋学义理和文学分析之作。

基于上述简要梳理,笔者认为《楚辞》训诂史大致可划分为八个时期:汉代、魏晋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明末清初、康熙中叶到雍正、乾隆到道光前期、道光中叶到清末民初。

四

言及《楚辞》训诂,我们不能不提到它与其他一些传统语言学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从传

统小学的三个分支——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来看,《楚辞》训诂与训诂学的关系应该是最为密切的,笔者将在本书中有关的章节中不断地涉及,兹不赘述。《楚辞》训诂除了与传统小学关系密切之外,与方言、文献、校勘、考据、历史、民俗等学科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或相互影响。考虑到历代训释古籍的重点是字词注释,且字词注释与语言文字学的关系尤其密切,这里主要简单地谈一下《楚辞》训诂与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或相互影响。

从文字学来说,汉字发展到战国时期,仍带有古文字的色彩,这从古代已发现的孔壁中书、汲冢竹书,以及现代已出土的包山楚简、九店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战国文字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战国文字上承春秋,下启秦汉,是中国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阶段,楚文字即其中之一。我们不难推测屈原写作楚辞时用的是古文字,但由于楚文字在汉代就难以辨识,即使演变为小篆、隶书后也多有传抄之误,故后人在为《楚辞》作注时,有时就必须考虑到某一字词是否存在讹误。遗憾的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辞》写本或抄本为证,所以后人为《楚辞》作注时有时只能凭借上下文来作文字上的猜测。可见,假如能看得到战国末或秦代的《楚辞》抄本,那无论是对《楚辞》训诂还是对于文字学研究本身,都将极具价值。另外,从汉字的运用来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汉字一直存在异体字、通假字、通用字、古今字、同音字、多音字、同义字(词)、多义字(词)等多种状态,这不仅迫使注释古书者进行文字上的比勘,而且这种比勘自然也为后人分析汉字的运用情况提供了极好的书证材料。循复往之,则形成研究文字运用者与训诂者、校勘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效应。《楚辞》历代注本甚多,不少注家运用文字学知识为之校勘或分析也甚勤,以至于形成了《楚辞》训诂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异文校订。就目前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种异文校订在晋代郭璞《楚辞注》中就已见端倪,随后又有隋代智骞《楚辞音》继承发扬,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融入的《楚辞释文》、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所附的《楚辞考异》、明末清初王夫之《楚辞通释》的异文校勘、清代林云铭《楚辞灯》的异文点明及辨误、王邦采《离骚汇订》中的专列“考异”之例、王荫《楚辞评注》的异文标注、朱骏声《离骚赋补注》的异文校订,最后到清末民初刘师培撰《楚辞考异》专书等,皆可看做《楚辞》异文校订的典型代表。反过来看,后代研究汉字运用现象者,也常常从前代《楚辞》注本中选取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其例则不胜枚举。

从音韵学来说,《楚辞》属于上古诗歌,不仅因其多楚语而难以诵读,且所牵涉的诗歌押韵,对后人研究上古语音系统具有重大的参考作用,这已被事实所证明。纵览《楚辞》古代书目要籍可知,历代研究《楚辞》音读的专书有十多部,较早的应是晋代徐邈的《楚辞音》(已佚),而现存最早的是隋代智骞的《楚辞音》(残卷),现存最完整的是明代屠峻的《楚辞协韵》,较完整而较有价值、有影响且力斥“叶音”之弊的是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清代有关《楚辞》音韵的著述则有邱仰文的《楚辞韵解》、方绩的《楚辞正音》、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江有诰的《楚辞韵读》等。这些研究《楚辞》音读的要籍,以及宋代以来《楚辞》注本中所包括的字词注音,以及清代以来所附录的音义专论,如徐焕龙《屈辞洗髓》所附的《屈辞简明音释》、张德纯《离骚节解》所附的《离骚本韵与正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所附《说韵》一卷、戴震《屈原赋注》中所附《音义》三卷等,由于都是伴随着音韵学研究的发展而共生的,因而对于音韵学的研究无疑有着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反之,《楚辞》训诂著述中,还有许多是受当时音韵学研究进程的影响或利用了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或成果。如在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二十几个“叶音”例,其理论基础明显是源于北周沈重等人所创立的“叶韵”说,而稍后的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大量叶音,则是《楚辞》注本中大力实践“叶韵”说的最早标本。如在明代,由于古音学仍不发达,故略早于陈第的汪瑗在《楚辞集解》中分析洪、朱等人的“叶音”例时,无法跳出“叶音”的窠臼;略晚于陈第的毛奇龄之《古今通韵》,仍不以古韵求古义。如在清代,由于陈第大

破“叶音”说和顾炎武等古音学家的影响,徐焕龙、张德纯、蒋骥等人在其注本中专附关于《楚辞》音韵的说明;戴震不仅在音韵学研究上卓有成效,而且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屈原赋注》中;其他如王念孙、江有诰等学者相关《楚辞》古韵之书,则在通“三古”旧音和证《楚辞》年代等方面颇见成效。

从方言学来说,研究汉语方言史的学者不能不提到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这是因为王逸生于楚地,又离屈原时代未远,更重要的是他对《楚辞》中的方言字词首先予以指出并加以解释。自王逸之后,还有郭璞、洪兴祖、朱熹、王夫之、戴震等诸家注本都注意了对方言字词的注释。这种情况相沿到民国时期,则出现了研究《楚辞》方言的首部专书——李翘的《屈宋方言考》。《楚辞》训诂中的方言训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阅读、理解《楚辞》的文字障碍,也使研究汉语方言者大受其益。从另一方面说,历代不少《楚辞》注本在字词注释时不仅或多或少吸收了如扬雄《方言》一类的方言词典解读,还汲取了方言研究的一些成果和古籍中的相关方言材料。其中,较早引《方言》一书为证的应是郭璞《楚辞注》,较为典型的则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戴震的《屈原赋注》,其具体的例子可参见本书的有关章节。

五

关于本书的研究原则和体例,也需作一简单说明。

本书的研究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首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的原则,它可分为总体和具体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即在阐述每个时期传统训诂发展及特点等背景的基础上,概述该时期《楚辞》训诂的总体情况;既注意考察某一注本在历代《楚辞》注本中的地位以及对他注本的继承或产生的影响,也注意把某一注本与同时代《楚辞》其他注本作横向的比较,体现该注本的训诂特色。具体而言,即在对历代《楚辞》重要注本的解剖与分析中,既注意考察某一注本的某一方面(如注音、释词、析句等)对《楚辞》重要注本的同方面的继承或产生的影响,也注意考察某一注本的某一方面与同时代《楚辞》重要注本相比而体现出的具体特征和创新特征。

其次,传统训诂和《楚辞》训诂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考虑到《楚辞》注本既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畴,那么它们必将体现传统训诂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而《楚辞》注本又属于集部书注,可能同时呈现其集部书注的独特性——尽管这种独特性也会因时代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同而有所变异。诚然,每部《楚辞》注本在注释方法上所呈现的侧重点会不一致,有的是因袭传统而侧重以传统训诂的方法,有的因需要体现《楚辞》的文学特征而较多采用集部书注的方法,还有的是把两种方法交叉运用。因此,本书则根据某一注本所具体采用的注释方法进行分别叙述或结合叙述。

第三,详尽举证分析与归纳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详尽举证分析是指在较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某一注本在篇目选择、体例安排、注音格式、词语训释、句意分析、章旨归纳、篇旨说明等细节方面的特点和方法予以较详细举证并作具体分析;归纳比较分析既是指对不需要展开分析的方面,如历代《楚辞》注本的简介、某一注家的作注原因的概述等进行的一般性归纳,又是指在对详尽举证分析的基础上,对诸注本中各方面的异同情况进行综合性的归纳和比较。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正文包括绪论、九个章节、结语三部分,后附参考文献和后记。具体章节的安排为:第一章至第八章分别对应笔者所划定的历代《楚辞》训诂分期,每一章先分别概说该时期的训诂

学和楚辞学情况,其中从第三章开始的楚辞研究概说中增加《楚辞》部分训诂著述概说的内容;第九章则是对前面各章节所述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比较和综述。另外,本书的引文注释格式为脚注,出现的参考文献(包括专节分析和概说的《楚辞》注本),均详细标明著者、文献名、版本(现代文献标明出版社)、出版年代(古文献则标注朝代)、页码等信息。本书尽可能地采用现代汉语规范字,但历代《楚辞》不同版本中存在的异文,以及分析原文或引用其他古籍时出现的通假字、通用字、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文字形体,则是由于行文的需要而不得已用之。

第一章 汉代的《楚辞》训诂

汉代是《楚辞》训诂的发生期。当时已有评屈论《骚》者，亦有少量与《楚辞》有关的注本，然皆尚未见全本传世。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唯一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训诂专书。

一、《楚辞》训诂兴起的主要原因

战国后期，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写下了以《离骚》为代表的多篇楚辞作品。然而，对屈原其人其诗的评价和研究却是从西汉开始的。在汉代以前，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大概只限于楚国，未见于先秦典籍。屈原是坚决抗秦者，秦王朝是不可能容忍其作品流传于世的，故屈原的作品“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传到汉代的”^①。最早记载屈原事迹和“楚辞”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的生平事迹见于《屈原贾生列传》，而“楚辞”一词则出自《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②之句。

那么，对《楚辞》注释和研究为什么会在汉代兴起呢？愚以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统治者对楚辞的喜好和提倡。汉代帝王为楚地人，不仅对于“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容易产生一种亲切感，而且还身体力行予以唱和，典型者如汉高祖刘邦所咏“楚辞”体的《大风歌》。汉武帝刘彻也喜欢楚辞，班固云：“严（庄）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悦）之。”^③汉武帝不仅甚悦楚辞，还撰有类似楚风的《秋风辞》。汉宣帝刘询，曾“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还有“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④之类专门评价楚辞之语。汉代帝王对楚辞的喜好与提倡，可以说是为文人学者注释和研究《楚辞》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其二，文人学者对屈原的认识和评价。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一些文人学者逐渐开始以儒家的眼光来看待屈原，愈来愈肯定屈原的思想，钦佩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推崇屈原的作品。如淮南王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⑤司马迁认为：“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⑥另外，王逸也是极力褒扬屈原及其作品

① 金开诚：《论汉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见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15 页。

②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143 页。

③ 班固：《汉书·朱买臣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791 页。

④ 班固：《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821、2829 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9 页。愚按：此语大意最早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但司马迁未说明是刘安所言。

⑥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482 页。

的重要人物之一(此略,下文将述之)。不过,汉人对屈原的认识也并非一面倒,其中也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对屈原并不理解。如贾谊《吊屈原赋》:“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闾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①这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赞扬,但贾谊又认为屈原自沉是不必要的,他可以“固自缩而远去”,“远浊世而自藏”。扬雄虽悲《离骚》之文而感动得流泪,但又批评屈原的自沉,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②。班固虽赞屈原为“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③,但又认为屈原昧于明哲保身而“露才扬己”,认为刘安、司马迁的评价有些过分。贾、扬、班对屈原所持的毁誉参半态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保守、偏狭意识。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对屈原的认识和批评,使《楚辞》的注释和研究有了思想上的基础。

其三,训诂学兴盛的影响。从训诂学史可知,西汉最高统治者实施抢救、整理古籍的一系列措施,奠定了训诂学兴起的基础;文字形体演变的障碍和读懂先秦典籍的需要,是训诂学兴起的直接动力;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则是训诂学兴盛的最重要因素。古文经学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不仅使东汉出现了以郑玄为代表的一批训诂大师,涌现了大量训诂著作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工具书,而且使得训诂范围从西汉的重视注释儒家经典扩大到东汉的注释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诸书。训诂学的兴盛,使《楚辞》训诂的兴起有了学术上的氛围。

二、王逸之前的《楚辞》注释和研究

清人屈复云:“《离骚》有注,自王叔师始,后诸家论著即详细处,要自王氏发之。”^④此话前半句不妥,因为《离骚》有注,并非是从王逸开始的。

《汉书》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⑤此为最早说及《楚辞》注本之史料。王逸《楚辞章句叙》亦云:“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这两则史料表明,刘安注本虽不传世,但它可作为有史记载的第一部解说《离骚》的注本,却是毫无疑义的。崔富章先生根据姜亮夫先生的考证,认为刘安“献《内篇》之外,尚有《楚辞》,武帝悦之,又‘使为《离骚传》’。安本崇拜屈原,编有九篇定本,久居楚地,谙练旧事,故《离骚传》(总叙)挥笔而就”^⑥。刘安的《楚辞》“九篇定本”,包括《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和《招隐士》,它们应是《楚辞》最早结集的作品。刘安之后百余年,刘向奉诏典校经书,始在刘安定本的基础上续辑《楚辞》十六卷。而王逸的《楚辞章句》十七卷,则是以刘向《楚辞》辑本为基础,再加上自己的《九思》。

据有关史料,王逸之前还有一些与楚辞相关的注本。如王逸云:“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⑦又云:“《天问》以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

①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93页。

② 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15页。

③ 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22页。

④ 屈复:《楚辞新注·凡例》,陕西通志馆排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关中丛书》本,第10页。

⑤ 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5页。

⑥ 崔富章:《楚辞书录解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⑦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见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补印本,第20-21页。

众,多无闻焉。”^①由此可知,西汉初期的刘向、扬雄等人曾为《天问》作注,东汉时期则有班固、贾逵等人的《离骚》注本。刘、扬、班、贾的注本,王逸盖已见到,但今均亡佚,我们只有从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摘录的班固《离骚赞序》和《离骚序》中,窥见班固等人作注之宗旨。与王逸同时代的著名经学家马融,也曾“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②等典籍,然马融之《离骚》注本亦亡佚。贾逵、马融等人的注本,目前我们也只能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窥其一斑^③。如此看来,即使到东汉中期,学者文人对屈原的作品研究重点也只是对《离骚》《天问》的单篇注释,而没有涉及所有的楚辞作品。因此,就其全面性、完整性而言,汉代真正意义上的《楚辞》训诂,无疑是王逸的《楚辞章句》。

三、王逸撰《楚辞章句》之动因

王逸(约89—158),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据《后汉书》王逸本传等史料记载,王逸在东汉安帝元初中(114—120)为校书郎,曾参编《东观汉记》。顺帝时为侍中,后又出任豫州刺史、豫章太守等职。王逸所撰的《楚辞章句》,大约是在他任校书郎时期。

那么,王逸作《楚辞章句》之动因何在呢?愚以为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参与评价屈原学术之争的需要,二是经学思潮的影响,三是不满前人旧注。

就第一个原因而言,以班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不仅从政治上否定屈原的斗争性,而且否认屈原本人的高尚品行。如班固认为刘安、司马迁等人评价屈原的志洁“虽与日月可争光也”,但“斯论似过其真”,并进一步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④在这里,班固认为屈原是昧于明哲保身,于是给屈原加上了“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的罪名。班固的这些议论,王逸是不赞同的。王逸指出: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⑤

实际上,王逸受屈原品格及其作品的影响,十分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正如他自己在《九思·叙》所说:

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⑥

①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后叙》,见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补印本,第50页。

② 范晔:《后汉书·马融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2页。

③ 如《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句下,洪氏引曰“贾逵云:羿之先祖也,为先王射官”;如《大招》“曼鹇鸚只”句下,洪氏云:“马融曰:其羽如纨,高首而修颈。”

④ 愚按:此为王逸引班固语。王逸:《楚辞章句·离骚赞序》,见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补印本,第5页。

⑤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见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补印本,第21页。

⑥ 王逸《楚辞章句·九思叙》,见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4页。

同时,王逸对屈原的代表作《离骚》的评价也很高,认为《离骚》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是在于怨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①。从当时的情况来说,王逸有对《离骚》如此深刻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王逸在学术上对班固的驳斥。

就第二个原因而言,汉代经学思潮盛行,今古文经学之争此起彼伏,学者文人多从儒家观念出发,用说经的方法来解读典籍,即使是像《离骚》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披上了“经”的外衣。总体上看,以经解《骚》成为当时的主导倾向,如刘安说《离骚》兼有《诗经》中的《国风》与《小雅》之旨,班固说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则不仅将《离骚》直接名之曰《离骚经》,还于《离骚后叙》中明确指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就第三个原因而言,王逸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刘安、扬雄、刘向、班固、贾逵等前人旧注,但从其《离骚》和《天问》的后序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所流露的不满。如他在《离骚后叙》中说:

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馀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撮。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又在《天问后叙》中云:

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既有解说,乃复多连蹇其文,濛濛其说,故厥义不昭,微旨不晰,自游览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

从这两段话,可见王逸不满前人旧注之一斑。

四、《楚辞章句》的训诂特色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注本,它诞生于训诂学已经相当昌盛的东汉时期,是当时出现的唯一的一部集部书注本,也是汉代《楚辞》注释的集大成。因此,较为详细地解剖《楚辞章句》,就能较为清楚地明了汉代的《楚辞》训诂特色。

(一)《楚辞章句》的训诂体例

这里所说的训诂体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指注本的大体安排,属广义的范畴;另一个方面是指具体作注时的格式,属狭义的范畴。弄清楚《楚辞章句》的训诂体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该注本的训诂体例,不仅标志着《楚辞》历代注本基本训诂体例的形成,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后世众多《楚辞》注本在训诂体例上有何发展或变化,有着较重要的参照和借鉴作用。

从注本的大体安排来看,《楚辞章句》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按照正文的卷数来排定,依次是:《离骚经》第一屈原、《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九

^①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见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60年补印本,第21页。

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大招》第十屈原或言景差、《惜誓》第十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这种安排,除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基本照搬以外,以后的诸多注本多有变更,其主要的变更是增加注家本人的序跋、增加补充论说,以及增加与理解《楚辞》有关的内容等。诸注本在总体体例安排上的具体变更,将于叙述的过程中加以介绍,在此从略。另外,从这种安排还可以看出,王逸是把自《离骚》至《渔父》的前七卷认定是屈原的作品,把卷八《九辩》和卷九《招魂》认定是宋玉的作品,而对卷十《大招》的作者则存二说。王逸对于《楚辞》诸篇作者的认定,一直影响到后世,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招魂》和《大招》两篇的作者。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汉书·艺文志》所说“屈原赋二十五篇”之语,后世也有争议。关于这些争议,笔者均将在后面讨论其他注本的章节中另行叙述。

从具体作注的格式来看,《楚辞章句》运用的是随文释义。在汉代,传统训诂学已出现了影响后世的三种主要训诂形式:正文体训诂、专著体训诂和传注体训诂。其中传注体训诂又叫随文释义,它从先秦古籍正文体训诂的形式发展而来。西汉时期,毛亨作《诗诂训传》,标志着随文释义这一训诂形式的正式产生。随文释义的形式不仅吸收了正文体训诂以字词句为解释对象的长处,而且注释对象又增添了对文章各方面,诸如天文地理、典章记闻、名物风俗,以及语法修辞、篇章题旨等内容,因而成为古代最常见、最适用的训诂形式,其应用的范围扩大到经、史、子、集各大部类的古籍。王逸所处的东汉时代,训诂学已很成熟,除大量的经部书注外,其他部类的古籍注本也有不少,当时较有名者如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高诱的《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和《战国策注》,等等。出于历史的原因和实用的考虑,从王逸开始采用随文释义这一形式为《楚辞》作注以后,后世的《楚辞》注家绝大多数予以了沿袭。

有一点必须提出,即王逸注释《楚辞》与赵岐注释《孟子》一样,标的都是“章句”的名称,但体例却不大一致。“章句”的最初含义,是限于分章断句,而不用於说义。《汉书·艺文志》载《尚书》有《欧阳章句》和《大小夏侯章句》,同时又有《欧阳说义》和《大小夏侯说义》,是“章句”不作字词注释的典型例证。随着时代的发展,类似传注的“章句”开始兴起,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汉代章句体著作,只有《楚辞章句》和《孟子章句》。类似传注的“章句”,多是重于章旨和句义的解说,《孟子章句》即如此,它分《孟子》七篇为 261 章,虽然有时是先释词句,后叙章旨,但更多的地方是直接串讲句义,并不先释字词。比较而言,《楚辞章句》则是先列篇题序文,再释词,后释句,且释词几乎占全部注释的一半,更接近传注体训诂的特点。

尽管《楚辞章句》用的是传注体训诂,但在实际运用时,它仍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它不作分章,而是逐句(少数隔两句)作注,偶尔也有隔三四句以上再注的。其隔三四句以上作注的例子,如《怀沙》“曾吟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如《天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如《大招》“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滂洋洋只”,等等。其注语或注音解词,或疏句义,或引旧注和群书,均依需要而定。其次,它所注的各卷,每卷之前均有序文,加上《离骚》和《天问》的后叙,共 19 篇。这些序文的内容,是说明作者和写作时地,也简释篇题旨意和阐述创作意图。第三,常用四言句的韵文作注,且注文往往隔句用韵。全书十七卷中,其中《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隐士》《九怀》诸卷的注释,绝大部分使用韵语,其他如《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篇,也有大量使用韵语为注的情况。例如《思美人》“媒绝路阻兮”注:“良友隔绝,道坏崩也。”又“言不可结而诒”注:“秘密之语,难传诵也。”(其中“崩”和“诵”为韵)如《惜往日》“谅聪不明而蔽壅兮”注:“君知浅短,无所照也。”又“使谗谀而日得”注:“佞人位高,家富饶也。”(其中“照”和“饶”为韵)如《远游》“漠虚静以恬愉兮”注:“恬然自守,内乐佚也。”又“澹无为而自得”注: